

# 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

——《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

宿白(北京大学 教授)

即将刊行的《云冈石窟卷》画册是《山西文物精品典藏》中的一册,它与已出版的同类画册相比,较突出地显示了云冈石窟可分早、中、晚三期的时间特征。我想就这个问题汇辑一些具体内容试述如下。这样的文字作为全面概括《云冈石窟卷》画册的序言很不合适,勉强跋于书后,供读者作为欣赏古代雕塑之余的参考吧。

云冈早期石窟即《魏书·释老志》所记“和平初(460年)……昙曜白(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亦即今云冈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此五窟内早期设计并雕凿的部分,有近椭圆形平面、穹隆顶、模拟草庐形式的窟室;充满窟内的巨大佛像;佛像的主要内容是与昙曜当时一再翻译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相配合的三世佛<sup>[1]</sup>;以及佛像的姿态、布局和浑厚磅礴的造型等。这些都与比它早的河西北凉以佛塔为中心的塔庙式石窟有异。因此,似可认为是综合了东方和西方多方面的因素,

在当时北魏都城平城新出现的一种模式。五窟中第十九窟的西胁洞、第十六窟和五窟内外的小龕大都竣工较晚,有可能迟到云冈中期乃至晚期。

中期即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七、八窟,第九、十窟,第十一至十三窟,第五、六窟和东端的第一、二窟与第三窟<sup>[2]</sup>等。这一期石窟有前后两室,也有单室,俱较方整,顶多凿平棊,且多双窟并开的组窟;窟内壁面上下分层、左右分栏地排列,内雕佛龕和本生、佛传题材,后者并附雕榜题;还有佛像出现宽大多襞的衣着和石窟的整体雕饰追求工丽等,都与前期情况异趣,显然这是石窟日趋东方化的演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期石窟的造像,出现了汉译《妙法莲华经》和《维摩诘所问经》的内容(前者如〈见宝塔品〉所记释迦、多宝并坐塔内的形像,后者如〈示疾品〉所记维摩诘和侍者像)。这些形像早于云冈的,现仅见于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壁画一处,壁画的年代约与该窟第

6号龕左侧的墨书题记中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纪年相距不远<sup>[3]</sup>,而炳灵壁画的来源有可能与406年鸠摩罗什与门下一在西秦东邻——当时佛教盛地的姚秦都城长安,重新译就并宣讲《法华》、《维摩》两经有关<sup>[4]</sup>。至于云冈中期《法华》、《维摩》形像题材的雕造,似亦受到长安影响。云冈中期的具体时间,主要在北魏迁洛之前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执政时的孝文帝在位时期(471~494年)。冯氏,长乐信都人,家世奉佛<sup>[5]</sup>,5世纪中期其父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441年生冯氏于长安,冯氏执政后又于长安为父朗兴建燕宣王庙。417年姚秦亡,罗什弟子留中原者东聚彭城,其后彭城高僧又多为冯氏和孝文帝所敬重,且颇有北入平城者<sup>[6]</sup>。因可推测,冯氏、孝文期间崇奉的佛教与长安派系关系密切<sup>[7]</sup>,因而云冈中期和前期比较,石窟的许多方面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应是北魏平城地区佛教更进一步汉化的反映。

晚期石窟的时期,始于迁洛(494年)前后迄于正光年间(520~525年)。迁洛后,上层亲贵对“旧都意重”(《魏书·广陵王羽传》),宣武帝时(500~515年),犹“冬朝京都(洛阳),夏归部落”(《魏书·尔朱荣传》),景明四年(503年)“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魏书·世宗纪》),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诏还说:“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魏书·肃宗纪》)可见迁都二十余年之后,平城尚大体维持着旧都风貌,云冈当亦不应有太大变化。云冈晚期石窟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多建中小型窟龕和单独的佛龕:中小型窟龕多开凿在云冈西部,其形制在中期平基顶近方形平面的石窟的基础上缩小、简化,流行三壁三龕式或三壁设坛式的窟内布局;单独的佛龕遍布于早中期石窟内外,龕楣雕饰复杂。此外,窟龕中的造像多成组配置,佛像都渐趋清秀,下垂衣袂折叠增多,菩萨帔帛出现交叉穿壁装饰等,也多展现于晚期。这类云冈晚期窟龕的新情况,应予关

注的是它们发生或流行的时间,都早于类似的洛阳龙门的北魏窟龕,前引熙平二年诏明令“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但接着又说“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因知此时平城仍有“门才术艺”之士为洛京所征求,所以推测龙门魏窟受到云冈晚期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不可理解的<sup>[8]</sup>。

(2007年12月5日)

[1] 参看《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25~26页。后辑入《中国石窟寺研究》,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历代三宝记》卷九记元魏北台译经云:“《付法藏传》四卷……和平三年(462年)诏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载兴,始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为了译文内容准确,文字工丽,“西域沙门吉迦夜……延兴二年(472年)为沙门统释昙曜于北台重译刘孝标笔受”(《付法藏因缘传》)六卷。462~472年,恰是昙曜于武周塞(今云冈)石窟雕造“昙曜五窟”期间。开窟、译经和译经地点显然不是偶然集聚,而当是关系密切的反映。这种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之北统·昙曜复兴佛法》条论释云:“太武帝毁法之时,诬言佛法本是虚诞,胡无此教,乃汉人无赖者所伪造。昙曜于大法再兴之后,乃译《付法藏传》以明释教之传来,历历可考。而且不数年中,吉迦夜又为曜重译之,盖皆意在昭示传灯之来由,而庶使法藏住持无绝也。”

[2] 以上皆以开凿石窟的时间言,有的窟内龕像雕造较晚,甚至迟至北魏以后,如第三窟右侧的一佛二菩萨。

[3] 炳灵寺第169窟内约绘于西秦时期的壁画有此二内容的共三号:第10号壁画右侧绘“维摩诘之像”,中绘“释迦牟尼佛”,左绘“文殊师利”;第11号壁画分上、下两栏,上栏绘“维摩诘之像”与“侍者之像”,下栏绘“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并坐塔内;第24号壁画千佛下方绘“多宝佛与释迦牟尼佛”并坐塔内。其中第10号壁画维摩诘示疾的布局

与大同云冈石窟第7、8两窟同题材的雕刻极为相近。参看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刊《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第256~2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 [4] 僧人宣讲，多辅以有关宣讲内容的壁画——“变相”，《历代名画记》卷五记晋宁兴中（363~365年）顾恺之“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应是较早之例。
- [5] 参看《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32页。
- [6] 如《广弘明集》卷二四孝文帝为亡僧《施帛设斋》所记“唱谛鹿苑”（平城北苑西山鹿野佛图）的徐州慧纪和“唱法北京”（平城）的徐州僧统等。

- [7] 参看《云冈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刊《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第76~7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后辑入《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30~137页。490年，冯氏卒，孝文亲政，494年迁洛后，益重罗什，《续高僧传》卷六《道登传》记罗什再传弟子道登及其同学法度“及到洛阳，（孝文）君臣僧尼莫不宾礼”。496年，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长安）常住寺……可于（罗什）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并访其“子胤，当加叙接”（《魏书·释老志》）。

- [8] 参看《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39~192页。

（责任编辑：张小舟）

· 新书介绍 ·

## 汉文佛籍目录

宿白 著

《汉文佛籍目录》是宿白先生在1979年春季为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开设必修课时所作的讲课稿。中国佛教考古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对其研究的前提是应该了解这些遗迹所表现的是何内容，以及当时为何要表现这些内容。这两个问题都需参考汉文佛籍。本讲稿包括三个部分：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汉文佛籍目录、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东土撰述。书中配有20余幅插图。

文物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16开 平装 定价32元